

開化期朝鮮的「國文」與漢字／漢文的糾葛

三 ッ 井 崇 著^{*}

李 欣 潔 譯^{**}

摘 要

本文試圖從漢字／漢文與朝鮮文字／朝鮮語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轉變的視角，來掌握理解朝鮮從十九世紀後半期至二十世紀（開化期）之間有關言語意識的諸種面貌。隨著《日朝修好條規》的締結而來的開放門戶，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乃至於日本的兼併，這可以說是朝鮮無論對內對外都被迫要改變的時期，而在這個時期，漢字／漢文的面目與位置也在國家的層次上起了變化。在與清朝的宗屬關係變得搖擺不定的情形下，朝向朝鮮文字的專用邁進的趨勢在國家的次元被重新評估，漢字／漢文的威信則因此被弱化了。在甲午改革（1894）當中有關〈公文式〉的規定是以與中國的宗屬關係的廢止為背景的，之後，以被稱為「國漢文」的文體的定型為基礎，漢字作為近代化知識的導入媒介，以此新的價值被重新認識。然而，一如以往，希冀漢字／漢文可以復權的朝鮮知識分子也如同過去一般激烈抵抗。

* 作者現任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專攻朝鮮近現代史、言語社會論。電子信箱：mitsuitakashi@hotmail.com。

** 譯者係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東亞系博士。

像這樣充滿對立與糾葛的面貌從殖民地時期一直延續到解放以後。

關鍵詞：近代化、語言／文字國族主義、漢字、漢文、朝鮮文字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 Sino-graph/Sino-writing in Ko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and Civilization —An Entangled Relationship

Mitsui Takashi

Li Hsin-chieh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rasp various facets of the conceptions of language revealed in Korea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namely, 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and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anja/Hanmun (the Sino-graph/Sino-writing) and Hangul (the Korean alphabet)/ Korean language. From the opening of Korea, which was a consequence of the signing of the Japan-Korea Treaty of Amity, to the Sino-Japanese and Russo-Japanese wars, to the Annexation of Korea to Japan, it was a period when Korea was forced to change, domestically and diplomatically, and in this period the topology of Hanja/Hanmun changed as well on the scale of the nation-state. As Korea’s tributary relation with the Qing court faltered, the movement aiming for monopolized use of

Hangul was re-estimated on the level of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prestige of Hanja/Hanmun was impaired. The regulation of the “Format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 issued in the Gabo Reform (1894) took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termination of the tributary relation with China. After that, the writing style coalesc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Sino-writing was established, with which Sino-graphs came to be recognized as having the new value of serving as a medium for introducing modern knowledge. However, as before, resistance from Korean intellectuals who wished to recuperate the prestige attached to Sino-graph/Sino-writing was intense. The conflicts and entanglements of the language issue not only existed in the colonial period, but also consequently carried over into the time of emancipatio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language nationalism, Sino-graph, Sino-writing, Hangul (the Korean alphabet)

開化期朝鮮的「國文」與漢字／漢文的糾葛

三 ツ 井 崇

李 欣 潔 譯

一、緒論

「朝鮮文字（Hangul）」與漢字，它們在現代的大韓民國（韓國）已成爲語言—文字民族主義的火種。雖然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朝鮮），迅速地廢除漢字的使用的主張業已成眞，然而在韓國，儘管一方面朝著「朝鮮文字」專用化的方向前進，但另一方面卻也因主張漢字教育的必要性的論點仍然可見，而總是有論爭因此展開。

可被視爲韓國國語學界的權威的「Hangul 學會」於1994年5月編輯了一本名爲《「苦痛的文字」，爲何要讓它起死回生呢？》的冊子。¹這是該會從報紙、雜誌等處收集而來，針對漢字使用容任論加以批判的論點而編成的。光看如：漢字的使用／教育是「舊時代的亡靈」，²是「對民族精神的全面挑戰」，³諸如此類的標題，就明白「漢

¹ 한글 학회 : 《「고통의 문자」 왜 부활시키려 하는가》(서울 : 한글 학회, 1994年)〔Hangul 學會 : 《「苦痛的文字」, 爲何要讓它起死回生呢?》(首爾 : Hangul 學會, 1994年)〕。

² 허재영 : 〈식민 교육의 잔재 한자교육 구시대적 망령이 되살아난다〉, 《建大新聞》, 1994年3月14日〔許在寧 : 〈作爲殖民教育的殘渣的漢字教育——舊時代的亡靈復活了〉, 《建大新聞》, 1994年3月14日〕。

³ 허응 : 〈한자혼용론 거래얼정면도전〉, 《한겨레신문》, 1994年3月18日〔許雄 : 〈漢字混用論是對民族精神的全面挑戰〉, 《hankyoreh》新聞, 1994年3月18日〕。

字」是以負面形象被掌握與認識的。有時候，有些論者以「朝鮮文字」的使用來強調民族的價值，而另外一些論者則以漢字使用論與日本的殖民支配一脈相承，因此應該加以避免，⁴ 這種論調應該是值得我們加以關注的。自始，由於該冊子只收集了漢字使用否定論的論點，只集中於論爭中的某一方的主張，因此在殖民地時期以前的開化期出現的那種非使用漢字不可的傾向是無可避免地被完全忘卻了。

儘管不難推測，如此將漢字否定論等同於「朝鮮文字」專用論的說法，是近代以來的「朝鮮語一文字」民族主義的根源，但從反面來說，這其實更暗示了「朝鮮文字」與漢字（或者漢文）在現代以前綿延不斷的關於兩者間孰輕孰重的糾葛關係。因此，光是一面倒地由排斥漢字即等同於「朝鮮文字」民族主義此一觀點來理解現代韓國的「語言一文字」意識，那是絕不妥當的。同樣地，就近代的情形而言，有關「朝鮮文字」與漢字（漢文）的種種糾葛，我們也有必要將它視為歷史的事實來加以描述，並考察它的意義。

再來，爲了獲得深入考察的線索，這裡我想先聚焦於兩條法令。

就在大韓民國建國後不久的1948年10月9日，〈關於「朝鮮文字」專用之法律〉（法律第六號）就被公布施行了。其全文（不包括附則）如下所示。

大韓民國的公用文書以朝鮮文字書之。只是在短期內，必要時也可與漢字並用之。⁵

1994年3月18日]。

- ⁴ 參見최기호：〈역사는 이미 「한글세대」 를 선언하고 있다：「한자교육 = 국제화」 는 지나친 논리의 비약〉，《한국대학신보》，1994年3月21日；허재영：〈한자복권론, 일제말 식민지배자논리와 동일〉，《상명대학교보》，1994年4月4日。〔崔起鎬：〈歷史已經宣告了「Hangul 世代」的來臨：「漢字教育等同於國際化」的說法是言過其實的過度推論〉，《韓國大學新報》，1994年3月21日；許在寧：〈漢字復權論與日帝末期的殖民支配者的邏輯毫無二致〉，《祥明大學報》，1994年4月4日〕等。
- ⁵ 鄭晉錫編：《韓國言論法令全集（1945-1981）》（首爾：財團法人寬勳 club 信永研究基金，1982年），頁668。

從這個規定看來，若要研究朝鮮近代史，我們應可意識到這則法律的意義不只限於是解放後的問題。這點從下述署於1894年11月21日而由朝鮮政府所公布的〈公文式〉（敕令第一號）的條目來看就可明白。

第十四條 法律敕令 總以國文爲本 漢文附譯 或混用國漢文⁶

先不論此條文制定之時的脈絡爲何，我們應該可以直接感受到上述兩則法令有著極其相似的法律內容吧。因此，爲了解現代韓國的「朝鮮文字」與漢字（漢文）兩者間的種種相對意識與糾葛關係，我想，先把握近代「國語」形成期所見「國文」（朝鮮文字）與「漢字／漢文」的糾葛是極有意義的。本文將先概觀式地說明前近代時期的狀況，然後聚焦於十九世紀末至朝鮮被併吞（1910）之時的狀況，試圖追問「國文」（朝鮮文字）與「漢字／漢文」兩者間的糾葛。

二、前近代的「諺文」——公領域裡的位置

如同眾所周知的，「朝鮮文字（訓民正音）」創製於1443年而公布於1446年。這可說是在經歷了紆餘曲折的歷程之後，朝鮮語得以根據其文法並以漢字之外的文字來加以標記，這確實成了一個劃時期的語言改革的基礎。伊藤英人以王室、佛教與女性爲關鍵詞，來扼要地論說從「訓民正音」公布後到開化期以前的「朝鮮文字」（諺文）的使用史。⁷ 根據伊藤氏所言，雖然被稱爲「諺解」的漢文的朝鮮語翻譯，「不僅止於佛典，對於民眾的教化書、國語學習書、農

⁶ 〈公文式〉，開國503年勅令第1號，1894年11月21日公布，收於宋炳基、朴容玉、朴漢禹編著：《韓末近代法令資料集I》（首爾：大韓民國國會圖書館，1970年），頁120。

⁷ 參見伊藤英人：〈朝鮮半島の書記史——不可避の自己としての漢語〉，收於中村春作、市來津由彥、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統「訓讀」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2010年）。

書、醫書等實用書、杜甫詩全譯、包含了四書的經書等等，一直在進行著」，但後來士大夫階層順讀漢文，而一般民眾與女性專用諺文這種階層化（以及性別化）的情形則持續進行著。⁸但從另一方面來說，翻譯文學與諺文小說的普及等，反映出民眾識字率的提升，這也是事實。伊藤氏指出，十五世紀以降「行政文書以漢文吏讀為主來書寫」，⁹全體而言，漢字與漢文無疑享有絕對的權威。

然而筆者在此想先確認的正是「諺文」的屬於公領域的性格。如果根據伊藤氏如上所說的，那麼一看到『『諺文』的屬於公領域的性格』，就看到了矛盾。伊藤氏所指出的絕對沒有錯誤，文字的使用確實反映出階級的差異。但是，那並不意味著「諺文」完全沒在公領域中被使用。論及「語言的近代」時，儘管每每很容易就被誤解，但前近代時期在官廳層級的地方，「諺文」其實仍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如上所見，儘管因時期（或朝代）的不同而有一些差異，可以確定的是，由王后所下詔的訓諭或任命書等類別的文書是由「諺文」書寫的（諺文教書、諺文教旨），而國王有時自己也以「諺文」詔諭諸如教書、諭旨、繪音等文書。¹⁰關於有必要將內容普遍地公告於民眾的文書，便積極地以「諺文」來翻譯它們。¹¹山內民博指出，從朝鮮後期的地方官衙所發出的「傳令」（命令書）中的「真諺翻謄」（就著漢文添加諺文翻譯）此一事例可知，文書行政（的效力）的確及於鄉

⁸ 伊藤英人：〈朝鮮半島の書記史——不可避の自己としての漢語〉，收於中村春作、市來津由彥、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統「訓讀」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頁153-154。

⁹ 伊藤英人：〈朝鮮半島の書記史——不可避の自己としての漢語〉，收於中村春作、市來津由彥、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統「訓讀」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頁152。

¹⁰ 李觀洙：〈朝鮮朝의 國語政策史〉〔〈朝鮮朝的國語政策史〉〕，《漢城大學論文集》第3號（1979年12月），頁33-40；山內民博：〈朝鮮後期鄉村社会と文字、文書——伝令と所志類をてがかりに〉，《韓國朝鮮の文化と社会》第6號（2007年10月），頁52。

¹¹ 李觀洙：〈朝鮮朝의 國語政策史〉〔〈朝鮮朝的國語政策史〉〕，《漢城大學論文集》第3號，頁27-30。

村社會的層次，「諺文」的使用是「被官衙認識，也被實際地利用，作為向不解漢文的民眾傳達官方意志的裝置」。¹²當然，民眾的識字率到什麼程度是無法確知的，但這裡可以肯定的是「諺文」的使用仍屬於公領域的運作的一環。

然而，經由如此往復說明可以確定的是，文字使用的階層分化此一事態是無法否定的。上文所觸及的關於「諺文」使用的實況，並沒有改變以「諺文」等同於民眾與婦女的文字此一認識為前提的說法。隨著往「近代」移動的步伐，這種狀況是如何地被問題化了呢？以下是我想審視的問題。

三、「朝鮮文字」採用問題之政治外交史的背景

(一) 朝鮮的開化與對日關係

就前近代的文字使用而言，那種總是以「訓民正音」為「諺文」，而以漢字／漢文為「真書（文）」的情形，是以朝鮮和中國的王朝（明與清）間的宗屬關係為前提而存在的。在此宗屬關係中，公文書與高級的知識的體系是以漢文為「真」的文章語，「諺文」則被視為是相對於或者從屬於漢文而存在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1894年的〈公文式〉裡「以國文為本」而置漢文於輔助地位（詳見後述）一事，是將兩種文字以及書面語的地位加以逆轉。然而，這不單止於是文字與詞語的問題而已。不是的，這些問題不只是與政治和外交體制的問題分不開，而且是顛覆了政治文化的事件。事實上，包含了〈公文式〉的規定等一連串改革的甲午改革，不只是明白否定了與中國的宗屬關係，而且在1897年成立的大韓帝國將國王高宗稱呼為「皇帝」等等，這其實可以說是政治上的根本的變革。因此，「諺文」在公領

¹² 山內民博：〈朝鮮後期鄉村社会と文字、文書——伝令と所志類をてがかりに〉，《韓国朝鮮の文化と社会》第6號，頁26-38、49。

域的使用範圍的擴大也伴隨了種種波折，這也是事實。本章將以〈公文式〉為基礎，從稍微寬廣的脈絡來掌握反思「諺文」在獲致國文化以前的歷史。

開化期是朝鮮的政治與外交體制變動頻繁的時期。1863年，第二十六代國王高宗¹³即位。然而，作為年幼的高宗的攝政大臣與生父的興宣大院君¹⁴掌握了實權。大院君採取的是將朱子學以外的學問與思想一律視為「邪教與邪說」的思想統治政策。對外則採取了鎖國政策。從這個時期開始，對日關係的問題也開始產生了。迎接了江戶幕府的終結而宣告了王政復古的日本，透過對馬藩希望將告知朝鮮此事的使節送至朝鮮，但由於日本當局的書契（外交文書）中存在「皇」、「敕」等文字，而遭到朝鮮當局拒絕。大院君政權垮臺而由王妃一族的閔氏掌權（閔氏政權）以來，日朝間也還是為書契問題而擺盪不定。日本當局漸漸以武力為後盾迫使朝鮮當局打開國門，終至於1876年締結了實則為不平等條約的《日朝修好條規》。¹⁵《日朝修好條規》的第一款雖有「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¹⁶之言，對於彼時的「自由」與「平等之權」之說，是日本方面假定朝鮮與清的宗主關係之毀棄的論據，而朝鮮方面則將其解釋為除了一直以來的與鄰國交往關係的維持以外別無其他意思，雙方的解釋其實相隔了十萬八千里。

無論如何，這事本身就朝鮮方面來說，確實是一種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觀的狀況。其中的糾葛可從下述同條約中的第三款條文顯現

¹³ 李熙（1852-1919），在位期間為1863-1907年。1897年稱帝，建立大韓帝國。1907年被日本強制退位。

¹⁴ 李昞應（1820-1898），高宗的親生父親，擔任攝政而握有實權。1864-1873年執政期間，採取名為衛正斥邪政策的鎖國攘夷政策。

¹⁵ 至《日朝修好條規》締結為止的始末，參見糟谷憲一：〈近代的外交体制の創出——朝鮮の場合を中心に〉，收於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外交と戦争》，《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第2輯，頁231-236。

¹⁶ 《高宗實錄》，卷十三，丙子十三（1876）年二月初三日條。

出來。

第三款 嗣後兩國往來公文日本用其國文自今十年間別具譯漢文一本朝鮮用真文¹⁷

對於始終以「真文」等同於漢文，並以這兩者可交互指稱為常識的朝鮮來說，對手國使用「國文」一事是具有衝擊性的。「自今十年間別具譯漢文一本」的部分，並不是原初的草案，而是以文言書寫而成的。這應該是依據朝鮮方面（接見大官申櫨¹⁸）所提出「朝鮮人無法閱讀日文，如果單送日文文書的話，那業務上的錯誤將是不可避免的。衷心希望可以添附漢文」¹⁹而做出的回應。當然，若考慮朝鮮其實有職司翻譯與通譯，而名為司譯院的官廳，日朝外交的場合也都有由朝鮮方面派遣來的翻譯官，「朝鮮人無法閱讀日文」一說是真是假著實令人懷疑。毋寧說，這或許是因為考慮到藉由接受「翻譯的漢文」來維持固有的形式。彼時朝鮮方面的外交姿態儘管看不出和先前有何不同，但要被整編進與先前不同的體制則是很清楚的了。

從這時起，朝鮮政府經歷了從到日本視察以及與清國公使館接觸等，轉而朝開化政策前進，而開化派的政治勢力也在這個過程中成長起來。1880年代，在行政的層次上，「朝鮮文字」的採用問題成為焦點，這是以如此這般國內與對外的事情為前提而產生的。

（二）《漢城周報》的「朝鮮文字」採用問題

——開化派與福澤諭吉

開化派很早就認識到「朝鮮文字」的必要性。對朝鮮的開化思

¹⁷ 《高宗實錄》卷十三，丙子十三（1876）年二月初三日條。

¹⁸ 申櫨（1811-1884），以朝鮮王朝的武臣的身分戮力於強化國防，在日朝以及朝美條約簽訂之時全權代表朝鮮。

¹⁹ 〈日鮮修好條約ノ締結 第二 第四節 修好條約ノ締結〉（東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JACAR），Ref.B06150029100，第397個圖像；《日鮮修好條規關係一件》，卷2（B-2-1-1-47-002）（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想起了很大影響的《易言》，是由1880年擔任修信使前往日本的金弘集²⁰受贈於清國公使館的黃遵憲而帶回國之談論國家富強的書籍。²¹該書全文在1880年代前半葉就已被翻譯成朝鮮語，希冀可以普及該書的閱讀。²²的確，說起「朝鮮文字」的採用問題，所謂開化的政治方針，所謂開化派的政治家與官僚集團的存在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以下要聚焦的是「朝鮮文字」的採用如何進入叫作《漢城周報》這份官報的始末。²³

在說到有關《漢城周報》的事物之時，有必要先觸及它的前身《漢城旬報》。它採用的風格是參考清日歐美各國的新聞雜誌等，然後以漢文將報導內容加以翻譯與引用，具有傳遞開化思想的官報的性格。這個新聞的發行是基於王室的命令²⁴而由漢城府來負責發刊的工作，但在1884年金玉均²⁵等人發動的甲申政變之際，承擔印刷與發行責任的博文局遭到破壞，刊行工作也因而中斷了。此後，在1886年復刊後就叫《漢城周報》了。該報刊載了以漢文、漢字與朝鮮文字

²⁰ 金弘集（1842-1896），穩健開化派的中心人物，甲午開化期的總理大臣。1896年遭親俄派倒臺，在漢城的路上遭民眾殺害。

²¹ 參見李光麟：《〈易言〉과 韓國의 開化思想》〔《〈易言〉與韓國的開化思想》〕，收於氏著：《韓國開化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4年，改訂版）。

²² 參見李光麟：《〈易言〉과 韓國의 開化思想》〔《〈易言〉與韓國的開化思想》〕，收於氏著：《韓國開化史研究》。

²³ 關於以下的始末，參照了後列的文獻：李光麟：〈漢城旬報와 漢城周報에 대한 一考察〉〔〈有關漢城旬報與漢城周報的一個考察〉〕，收於氏著：《韓國開化史研究》；原田環：〈井上角五郎と《漢城旬報》〉，《季刊三千里》第40號（1984年11月）；稻葉繼雄：〈井上角五郎と《漢城旬報》《漢城周報》——ハングル採用問題を中心に〉，《文藝言語研究（言語篇）》第12號（1987年9月），頁209-225；김봉진：〈개화기 신문과 일본：후쿠자와 유키치를 중심으로〉，收於위암장지연선생기념사업회：《한국근대언론의 재조명》（서울：커뮤니케이션북스，2001年）〔金鳳珍：〈開化期的新聞與日本：以福澤諭吉爲中心〉〕，收於韋庵張志淵先生記念事業會編：《韓國近代言論的再照明》（首爾：Communication Books，2001年）。

²⁴ 《承政院日記》高宗二十年癸未一月二十一日（1883年2月27日）。

²⁵ 金玉均（1851-1894），急進開化派的中心人物。作爲甲申政變的中心人物而活躍於歷史的舞臺，失敗後亡命於日本。1894年計劃與李鴻章會談而前往上海，於當地被暗殺。

交錯使用，以及純朝鮮文字三種方式書寫而成的報導。這裡想提出的問題是，到底是經歷了什麼樣的始末，「朝鮮文字」才得以在這個階段被採用。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正在於開化派和日本的關係。

一開始，新聞發行的契機是身為正使的修信使朴泳孝²⁶被派遣至日本一事。更直接的是，壬午軍亂（1882）²⁷後，爲了恢復日本與朝鮮之間的關係，朴泳孝也肩負視察日本現代化的現況之責。此時，身為開化派的朴泳孝與福澤諭吉會談，也向福澤氏請教有關教育施策的意見。作爲回應，福澤氏強調了派遣留學生到日本與發行新聞兩件事。接著，在福澤氏的介紹下，派遣了新聞編輯和技術人員到朝鮮。朴泳孝被任命爲漢城府判尹（長官）並接受發行新聞的王命是發生在1883年1月的事。再者，從1881年開始留學於慶應義塾而與朴泳孝一行同時歸國的俞吉濬²⁸也在次月被任命爲統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處理外交與通商事務的官廳）的主事（事務官），這件事看來無疑也與福澤氏的建議有連動關係。然而，朴泳孝於同年4月被解職，而俞吉濬也辭職，新聞發行的計畫不得不暫時中止。此後，一部分的日本職員也回國，只留下井上角五郎²⁹與其他幾個人勉強留在朝鮮。新聞

²⁶ 朴泳孝（1861-1939），以開化派的中心人物在殖民地時期屬於親日派。甲申政變後被流放於濟州島，日本兼併韓國後被銓敘爲日本的侯爵。

²⁷ 雖然依據開化政策而設立了新式的軍隊，但另一方面卻也造成舊式軍隊的兵士對惡劣待遇的不滿。1882年7月由於不公正的俸給米的支給，舊式軍隊的兵士所累積的不滿終於爆發開來，在漢城引發暴動。由於這場暴動，日本公使館被襲擊，大院君又再度掌權。日清兩國都派軍隊介入，但暴動後，清將大院君幽禁起來，繼續在漢城駐留軍隊。赴日的修信使就是爲了這件事而帶有謝罪使的性格。

²⁸ 俞吉濬（1856-1914），政治家、開化思想家。1881年身為朝士視察團的一員赴日，是最初在慶應義塾學習的日本留學生之一。回國後前往美國留學。甲申政變後，因與急進開化派關係密切而遭逮捕。甲午改革時加入樹立開化派政權。然而之後因親俄派的政變而亡命日本。日本兼併朝鮮之時被授予男爵的爵位，但拒絕接受爵位。

²⁹ 井上角五郎（1860-1938），日本的政治家與實業家。因與甲申政變有所關聯，失敗後而逃往日本。不過隔年又再度前往朝鮮。1887年歸國，1890年成爲眾議院議員。

事業在得到總理交涉通商事務衙門協辦金允植等的支持下開始起動，往《漢城旬報》的創刊前進。

《漢城旬報》發行之際，身為日本人而擔任中心角色的就是井上角五郎。他身為博文局的職員而與新聞的發行有直接的關係。曾經是福澤氏學生的井上氏希冀可以實現福澤氏的意向。福澤氏本人也對朝鮮境內的新聞發行寄予厚望。從福澤氏寫給井上氏的書信中曾論及「以朝鮮的假名文字，讓人明白淺近的理學與醫學的道理，再者，滑稽諧謔小說等等也會很吸引人吧」、「每有機會就以（朝鮮的）假名來一改朝鮮的舊主義」³⁰一事可知，他是很強烈地意識到使用朝鮮文字的必要性。井上氏也認同他的看法，不但學習朝鮮語，也開始研究交錯使用了漢字與朝鮮文字的文體。最初，關於這一點，金允植³¹與博文局的職員們當初是很消極的。³²井上氏的回憶裡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軼事。請參看下述引文：

（福澤）先生另外向築地的活版印刷廠訂購了朝鮮諺文的活字。這些活字很能彰顯先生的氣象，那就是一旦動念就非做不可的人格特質。

福澤先生向來認為支那就是因為沒有像我們的這種交錯了假名的普通文體，所以沒辦法進行下層社會的教育，這對導向文明是不

³⁰ 福澤諭吉：〈井上角五郎宛福澤諭吉書簡、明治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收於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書簡集》（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卷4，頁55。

³¹ 金允植（1835-1922），穩健開化派的中心人物。1881年前往天津，與洋務派官僚締結強固的關係。1882年的壬午軍亂與1894年的甲申政變之時都曾要求清廷派兵。不過，之後因反對高宗與俄羅斯接近而遭流放。1894年回歸政界，在甲午改革的政府裡負責外交工作。日本兼併朝鮮時被授予子爵的爵位，不過在三一運動之時，因提出獨立請願書而被剝奪爵位。

³² 井上角五郎：《福沢先生の朝鮮御經營と現代朝鮮の文化とに就いて》，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政治篇》，《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4年），第7冊，頁283-284。

容易的。不過，在朝鮮是有諺文的。知道了（諺文）大概可以像日本的平假名（いろは）一般被使用，先生認為，光是有這個，朝鮮也就能躋身於開化國家之林了，他也為此感到喜悅。

為此先生也沒找人談過就積極地去訂購朝鮮的諺文活字。然而（朝鮮的）一行人後來知道了這件事之後都擔心，光是新式的新聞的興起在朝鮮都已受到眾人的反對，使用諺文恐怕將使得上流階級完全不願意閱讀，他們因而拜託他暫時務必先觀望。先生答覆「歡喜接受。鑄造費由我自己來支付，我願意等待用得上它們的一天。」這些諺文活字就是我後來買下來的東西。我成了朝鮮最早開始使用諺文活字的人。³³

事情的對錯先不論，若考慮朝鮮當時的情形，「一行人後來知道了這件事之後都擔心，光是新式的新聞的興起在朝鮮都已受到眾人的反對，使用諺文恐怕將使得上流階級完全不願意閱讀，他們因而拜託他暫時務必先觀望。」這個說法，並不是不可能的。看到朝鮮明確地往開化政策的方向啓航，國內的衛正斥邪派的反擊也日漸聲勢高漲。³⁴這不只是國內的問題而已，在與清朝的宗屬關係還持續著的狀況下，在公式文書裡使用朝鮮文字，代表的是朝鮮的文化體質的轉變，有其政治問題化的危險性。要順帶說明的是，關於訂購朝鮮文字的活字一事，井上氏的記述並不正確。這是在1883年由第三度前往日本訪問的金玉均委託訂製的，而他曾向福澤氏借款支付製作費用。³⁵

甲申政變之後回國的井上氏，1884年12月再度前往韓國時，他委託金允植轉交請願書給國王高宗。內容如下：

³³ 井上角五郎：《福澤先生の朝鮮御經營と現代朝鮮の文化とに就いて》，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政治篇》，《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第7冊，頁272-273。

³⁴ 從1881年的年初開始朝鮮中南部的兩班階層聚集於漢城，三番兩次擴大上訴運動的規模（辛巳斥邪上訴運動）。

³⁵ 石河幹明：《福澤論吉傳》（東京：岩波書店，1932年），卷3，頁429。

教化之道是設置學校、設立新報。道德是我們擅長的，再來更要進一步精進。殖產是我們不擅長的，不能不迅速地加以改進。大家現在該做的就是等待教化之道的實現而已。教化之道難道不是應該被視為當務之急嗎？然而漢文的理解很困難，而且學習不易。所幸有諺文，就像日文的平假名與泰西的ABC，十分便利。據此來寫作新報，人民一旦可以普遍地明白國內外的事情，就必然會自己奮發興起。以此來教育兒童，甚至可及於國中一字不識的白丁。但願從今天起，國家永遠的基礎被開啓，更添世宗大王制定正音的盛意。³⁶

接著，在1885年5月藉由高宗取得新聞發行的許可，《漢城周報》邁向發行之路。

《漢城周報》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它容納了漢文與朝鮮文字交錯使用的新文體。井上氏與開化派的交情甚深，他雇用身為第一回修信使的隨行員而名叫姜瑋³⁷的人擔任家庭教師，開始了他對交錯使用漢文與朝鮮文字的文體的研究。根據井上氏的記錄：

我一直想著，爲了諺文使用的計劃，研究朝鮮語與諺文這件事，確實有其必要，所以請人到府服務幫我心無旁騖地勉力從事這項研究，爲此，特別請了一個叫做姜瑋的人來當我的家庭教師。姜瑋無論是就儒學還是古典研究來說都是在當代享有盛名的人物。我常常就諺文使用的問題與他切磋諮商。如同先生所希望的，創作諺文與漢文混合使用的文體絕對不是不可能的事。

姜瑋當時曾經跟我說的是：「從前宮中的王妃們，曾寫作在漢

³⁶ 井上角五郎：《福沢先生の朝鮮御經營と現代朝鮮の文化とに就いて》，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政治篇》，《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第7冊，頁303-304。

³⁷ 姜瑋（1820-1884），朝鮮時代末期的詩人與開化思想家，《日朝修好條規》締結之時輔佐全權代表申櫛。曾於1880年與1882年兩度赴日，壬午軍亂後在上海天津與洋務派人士相交流，展開積極的外交活動。

文裡夾雜正音的文章，那也就是當今所說的諺文。儘管沒讓外面的人知道實際上世上真有這種漢諺混合文，但若是他們如此實行，應該是很便利的吧。」他時常為我進行調查。³⁸

這個說法是以朝鮮的王妃使用漢諺混合的文體為例，希望可以確保交錯使用漢字與朝鮮文字的歷史正當性，這是值得注意的。就在井上氏為了新聞的復刊而想回日本訂購機械與設備之時，高宗下了內命要新發行的新聞使用朝鮮文字。³⁹對此，井上氏說到，這是因為金允植在井上氏先前的要望書中附上姜瑋的文體研究的成果，並因而獲得國王的肯定所致。⁴⁰

關於《漢城周報》採用了朝鮮文字一事究竟是誰的貢獻，此一問題屢屢成為討論的焦點。朝鮮的知識人、開化派政治家與官僚、井上氏、福澤氏、國王高宗等，分別與種種不同的主體相關聯。因此，只注意一部分的人來討論他們對此事的貢獻，絕對不可能得出公正的歷史解釋。⁴¹不過，毋庸贅言的是，若就政策的實行最終的決定權而言，國王的許可就是很重要的了。

確實，雖然有些也與日本大有關係，以壬午軍亂為契機，開化派分裂為對日協調對清獨立派（「獨立黨」急進開化派）和對清協調派（「事大黨」穩健開化派）。甲申政變以降，前者失勢，日本的勢力

³⁸ 井上角五郎：《福沢先生の朝鮮御經營と現代朝鮮の文化とに就いて》，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政治篇》，《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第7冊，頁283。

³⁹ 井上角五郎：《福沢先生の朝鮮御經營と現代朝鮮の文化とに就いて》，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政治篇》，《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第7冊，頁303。

⁴⁰ 井上角五郎：《福沢先生の朝鮮御經營と現代朝鮮の文化とに就いて》，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政治篇》，《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第7冊，頁304。

⁴¹ 最極端的例子是山野車輪的《マンガ嫌韓流》（東京：晉遊舎，2005年）。該書強調井上氏一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將其標舉為「日本人普及朝鮮文字」的正面事例。關於這種做法的問題，請參見三ツ井崇：《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言語》（東京：明石書店，2010年），第1章。

也向後退了。再者，閔氏政權在清的宗主權強化的趨勢下，其開化政策也不得不以對清的從屬形式去發展。從一開始在《漢城周報》創刊之際，支持井上氏的金允植就是穩健開化派的人物。考慮到這樣的始末，就可以明白，朝鮮文字的採用問題不是光從和日本的關係上來理解就可以的事。這裡，爲了補足理解上的疏漏之處，朝鮮與清的關係的推移也有必要同時加以考慮。

（三）在「屬國」和「自主」之間——對清關係⁴²

《日本朝鮮修好條規》締結之時暴露出來的問題是，關於朝鮮究竟是清的「屬國」還是「自主」的國家這種二分法，這是朝鮮的條約締結國日本以及歐美諸國的思考方式；然而另一方當事者朝鮮以及清，則持有朝鮮既是清的「屬國」也擁有「自主」（「屬國自主」）這種從外面看來不容易理解的認識。田保橋潔論及：「從法理來論的話，朝鮮是清的藩屬，遵循『人臣無外交義』的大義，外交上須一一向清的禮部諮詢會商，經由皇帝的敕裁才能施行。然而朝鮮國王對於與鄰國的交往，從一開始就是將一切的外交先加以實施之後，再向禮部諮詢會商報告。這也就是具有外交自主之實的緣由。」⁴³當時的慣例是，儘管朝鮮要向清朝貢，但在有關內政外交方面，一切都不受清的干涉。但是，關於這個所謂「屬國自主」的理解，在作爲當事者的朝鮮與清之間也還是存在著解釋上的分歧。

朝鮮在與歐美諸國締結條約之時，除了條約本文，另外還由朝鮮國王添付屬邦聲明。在締結《朝美條約》之時，從朝鮮發出的「照

⁴² 以下記述參考了糟谷憲一：〈近代的外交体制の創出——朝鮮の場合を中心に〉，收於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外交と戦争》，《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第2輯；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年）。

⁴³ 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関係の研究》（京城：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40年），上卷，頁312。

會」中提及「朝鮮向來是中國的屬邦。然而內政與外交上向來平等地任由大朝鮮國的君主自主。」⁴⁴ 彼時，對朝鮮方面來說是要致力於將其理解為「屬國自主」的「自主」的公認保證，但相對於此，清朝方面則認為應該是要將「自主」弱化為名義上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朝鮮透過文字強調「自主」，但相對於此，清朝強調的則是「屬國」。⁴⁵ 壬午軍亂以後，清朝確實是朝強化宗屬關係的政策前進。《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⁴⁶（1882）、朝俄秘密協定問題⁴⁷（1885-1886）、對歐美公使派遣問題⁴⁸（1887-1891）等加強了宗主權強化的動向。甲申政變也是急進開化派在面對那樣的壓力下而有的政變。朝鮮在秘密協定問題或者公使派遣問題上的動向，也是強烈意識到「自主」的國王以及政府層級對宗主權強化的抵抗。

站在這樣的背景之上，我想再次思索朝鮮文字的採用問題。朝鮮文字的採用對急進開化派來說，可說是從清朝獨立出來的象徵。可是，考慮到如上所述的外交背景，對穩健開化派與國王身邊的人來說，不也十足能夠對應於「內治」的範圍。實際上，多數的行政文書

⁴⁴ 轉引自糟谷憲一：〈近代的外交体制の創出——朝鮮の場合を中心に〉，收於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外交と戦争》，《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第2輯，頁237。

⁴⁵ 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頁368。

⁴⁶ 此為有關清與朝鮮通商的條約。其中雖有欲將清與朝鮮的貿易體制朝向自由貿易體制轉換的內容，但清藉著這個通商章程，強迫朝鮮接受許多不平等的項目。藉此，宗屬關係被重整與強化。

⁴⁷ 1885-1886年間發生了兩次的事件。最初，從1884年年底，國王與德意志籍外交顧問 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爲了抑制清的勢力而接近俄羅斯，並締結僱聘俄籍陸軍教官的秘密協定。不過清命令金允植要他拒絕該協定的簽署。第二是，國王和閔氏一族與俄羅斯締結請求「保護」的協定。對此，清對朝鮮政府強力譴責，甚至引起袁世凱向李鴻章建議廢黜國王。

⁴⁸ 朝鮮在與各國締結條約後，決定於1887年派遣公使到各國。此時，清發出了關於經皇帝裁可後的派遣、此派遣非全權公使而是三等公使、朝鮮公使與清國公使的位階的決定等與位階關係相關的通告。不過在派任了駐美朝鮮大使（朴定陽）之後，由清發出的通知一個也沒遵守，清廷的責難由此而生。

依然是以漢文爲主，而以「真諺翻謄」的文書形式來施行，這也可被視爲是在同一條延長線上吧。事實上，《漢城周報》的文字使用，與行政有關的文章就用漢字，或者用漢字與朝鮮文字交雜的文體，除此以外的雜報或啓蒙的論說等就以朝鮮文字來書寫。這也可想成是與以前的朝鮮文字使用的功能性的意味相合。然而，若考慮到這是背離於清朝意向而屬於強烈自主的志向中的內政的部分，從而國內的衛正斥邪派的反擊是免不了的，那麼國王與政府上層試圖在官報上使用朝鮮文字恐怕就不能說是毫無特定意圖的舉措，相反地，光是這件事就充分暗示了政治文化的轉變。當然，《漢城周報》中漢文的報導佔絕對多數，1887年以後，漢字與朝鮮文字的交錯文以及朝鮮文字的報導就絕跡了。無論如何，在經歷了甲午改革，以及從有關朝鮮文字採用的種種糾葛日益表面化的情形來看的話，《漢城周報》採用朝鮮文字的決定及其相關背景，正是孕育了那個語文糾葛（特別是國內的）的絕大契機。

四、朝鮮文字的「國文」化及其糾葛

（一）「國文」的象徵價值

如同反覆說明的，關於朝鮮文字與漢字，朝鮮語與漢文的價值觀的絕大轉變是始於1894年的甲午改革之時。讓我們再看一次這個時候發出的敕令第一號〈公文式〉中的規定。

第十四條 法律敕令 總以國文爲本 漢文附譯 或混用國漢文

諺文成爲國文，被放置於公文書所用的正式的書面語的地位。漢文作爲外國語而落入補助語的地位（關於「國漢文」，將於次節討論）。從這裡可以讀到，「國」有「民族國家（nation）」形成的意圖，也很容易可以讀到與中國的宗屬關係的廢止。不過，若考慮到這個語

言的改革是作為甲午改革的一環來施行的，那麼，先理解關於甲午改革的事也就很重要了。

甲午改革始於1894這一年，這同時也是甲午農民戰爭（東學黨之亂）以及日清戰爭開始的一年。1894年2月開始的甲午農民戰爭，高唱打倒閔氏政權與驅逐日本的民眾蜂起。對此，朝鮮政府於6月向清朝請求出兵。同時，日本也以保護公使館與居留人民的名義決定出兵朝鮮。農民軍受此影響，與政府簽署和議，暫時撤離。然而隨後，日清兩國的軍隊並不撤離。日本方面強烈干預朝鮮的內政改革的動作，引起清朝與朝鮮的抗議，但日本以軍事力量為後盾打倒了閔氏政權。再來，朝鮮方面也通告毀棄《中朝商民水陸通商章程》等三章程，以此斷絕了與清的宗屬關係。與此同時，日本也開始攻擊清的北洋艦隊，開啓了日清戰爭（1894年7月）。接下來，就在同年7月，在日本的支援下成立了以金弘集為中心的開化派政權。⁴⁹接著，從此到1896年為止施行於朝鮮的內政改革即是甲午改革。這個改革始於行政與財政，身分制的撤廢、家族制度等社會制度的改革等，在廣大的範圍內施行大幅度的改革。科舉制度的撤廢、清的年號的撤廢，與「開國紀年」的使用等，採用的是與清的宗屬關係於名於實都加以廢止的政策。接著採用了陽曆，同時開始使用自己的年號（建陽）。⁵⁰

就像光看這些施策就可明白的，宗屬關係的毀棄是甲午改革的主要目的。⁵¹主導改革的開化派勢力不是從前金允植等人的穩健開化

⁴⁹ 金弘集政權，在與日本的關係之間，不得不讓日本的內政干涉合法化，也不得不對日本軍合作。特別是後者的影響還波及朝鮮民眾，成為喚起朝鮮全體男女反彈的契機。同年10月，全羅道再度農民軍蜂起，擴及朝鮮全境（甲午農民戰爭第二次蜂起）。他們的目的是驅逐日本的勢力，打倒開化派政權。當然，甲午改革政權在此之後，親日的勢力沒有理由再延續，王妃殺害事件前後（1895）親俄勢力抬頭，兩股勢力幾度交替。

⁵⁰ 再來，甲午改革後，大韓帝國開始運作，國王被改稱為「皇帝」。

⁵¹ 關於這一點，月腳達彥指出「由於主權國家形成的課題集中於宗屬關係的否定，在甲午改革中，例如不平等條約的撤廢等萬國公法體制內的『平等性』的確保，或者往萬國『對峙』的方向的國族主義的發動相對是比較弱的。」這點很值得注意。參見月腳達彥：〈甲午改革の近代國家構想〉，

派，而是「一直以來在高宗的對清牽制政策下，熟悉外國語與國際知識，並且與駐漢城的各國公使館有往來而浮上檯面」⁵²的少壯開化派階層。由此可知，這是意味著對清協調派早已失卻主導權的絕大變化。朝鮮文字的「國文」化與漢文地位的轉換在此脈絡下，首先就不能不被賦予重大意義。

然而，究竟爲什麼在這個時間點上，朝鮮文字的使用成爲公文化的了？可以明確說明這點的資料目前還付之闕如，但聚焦於作爲改革的主導勢力的一員的俞吉濬所論，可以幫我們試著思索這個問題。

如同先前觸及的，俞吉濬是最早留學日本的學生之一。他在慶應義塾學習，受到福澤諭吉的開化思想的影響。他的著作《西遊見聞》（1887年完成，1894年刊行）強烈受到福澤氏的《西洋事情》的影響。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他的條目是根據《西洋事情》的各條目完整地或部分地翻譯過來的。⁵³ 俞吉濬的《西遊見聞》以漢字與朝鮮文字交錯使用的文體（國漢文）來寫成。這就是與其他開化派人士相比，也是很特殊的。俞氏接著還寫作叫做《大韓文典》（1909）的文法書等等，足見他對語言與文字的關心是非常強烈的。俞氏寫作《西遊見聞》之時論及「混集我文與漢字，不修飾文章的體裁，務必使用俗語，一切總以能達意爲主。」⁵⁴ 將朝鮮文字與漢字兩相對照，而稱前者爲「我文」這點值得注意。再來，俞氏還說到：

環顧字內的萬邦，由於各邦語言不同，文字也因而不同。或許可以說，語言是以聲音來發出人的思慮，而文字則是以形象來

《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第33集（1995年10月），頁73。這在思考此時顯現出來的語言文字國族主義的性格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⁵² 月腳達彥：〈甲午改革の近代国家構想〉，《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第33集，頁73。

⁵³ 參見月腳達彥：《朝鮮開化思想とナショナリズム——近代朝鮮の形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第2章。

⁵⁴ 俞吉濬：《西遊見聞（全）·序》（東京：交詢社，1895年），收於俞吉濬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俞吉濬全書》（首爾：一潮閣，1970年），第1冊，頁5。

顯現人的思慮。如此看來，語言與文字分則為二，合則為一。我文亦即是我先王創造的人文，而漢字是中國通用的東西。我對於沒能力純粹使用我們的文字感到慚愧。⁵⁵

換句話說，「各其邦」的「人」，有著各式各樣的思慮而與語言和文字相結合，以此為前提，可以明確分辨的是中國和朝鮮是不同的國家，漢字是中國的文字，「我文」是朝鮮的文字。此時的漢字，已成了全然作為他者而被意識著的東西。此外，在《大韓文典》的草稿本《朝鮮文典》（被認為是從1897年到1904年之間的東西）的〈序〉裡，如下的言辭也值得注意。

我們自先民以來借用漢土的文字與本國的文字相混合，國語受到漢語的影響，語言的獨立性幾近消失殆盡……。⁵⁶

由於漢字與漢文使得「國語的」獨立性喪失，從這個見解來看，再次可以看到「漢字—漢文」和「朝鮮文字—朝鮮語」這種文字與語言的一體性的認識。像這樣的「漢字—漢文」和「朝鮮文字—朝鮮語」的關係的認識，或者「言語—文字」觀，是有〈公文式〉為其背景的。

甲午改革中的語言改革並不只見於〈公文式〉而已，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教育的面向。廢止了科舉，建立了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朝鮮政府在1894年7月設置了學務衙門（隔年開始稱為「學部」），在學務衙門中的編輯局的職掌之一就標榜的是「國文綴字」，它直接被高舉為關於教科用書的編纂的事項。事實上，使用了朝鮮文字來編纂的教科書為數眾多，無論官／公／私立的初等教育裡，都施行了朝鮮文字的教育。再來，同時期裡，除了刊行以朝鮮文字書寫的新聞、雜

⁵⁵ 俞吉濬：《西遊見聞（全）·序》，收於俞吉濬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俞吉濬全書》，第1冊，頁6。

⁵⁶ 俞吉濬：〈朝鮮文典·序〉，收於金敏洙、高永根編：《歷代韓國文法大系》（首爾：塔出版社，1977年），第1部，第1冊。

誌、文學作品以外，在此前後翻譯的聖經也使用朝鮮文字。「國文」的使用範圍擴大了。另外，與此同時，種種促進朝鮮文字使用與書面語的規範的論見陸續被發表（後述）。從彼時開始，身為朝鮮語學者和教育家而十分活躍的就是有名的周時經。⁵⁷

這樣的趨勢，在《第二次日韓協約》（1905）以後的「保護國」時期也還是被繼承著。在初等教育中，延續至當時的「讀書」、「作文」、「習字」全被統合併入「國語」科（1906年「普通學校令施行規則」）。大韓帝國（1897-1910）政府的「國文」改革也從這個時期起開始規範化。作為開化思想家的池錫永⁵⁸於1905年提出國文改革方案，向學部上疏《新訂國文》，這在同年裡的7月19日被簽署公布。⁵⁹然而，對此相關內容的攻擊在朝鮮語研究學者間湧現。由於議論紛至沓來，政府接受了這些議論，在學部內設置了「國文研究所」，以綴字法為中心針對某些項目聘請研究者來進行討論。⁶⁰在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的情形下，作為日漸活躍的愛國運動的一環，朝鮮文字教育與研究的持續進行是重要的。

不過，就像「保護國」的形態一樣，在日本的直接的干涉日益強化的情形下，日本語終至浸透了整個初等、中等、高等教育。⁶¹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從愛國啓蒙運動當中日漸形成了要從日本獨立出來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⁶²這裡也不能不看到，這種朝鮮文字

⁵⁷ 周時經（1876-1914），近代朝鮮語學的先驅。就學於漢城的培在學堂。從《獨立新聞》創刊時開始擔任實務，很早就養成了對語言的研究企圖，後來在私立學校教授朝鮮語，培育了眾多學生。也曾擔任殖民地時期的語言運動團體朝鮮語研究會（朝鮮語學會）的主要成員的老師。

⁵⁸ 池錫永（1855-1935），朝鮮時代末期的開化思想家、醫學家、朝鮮語學者和政治家。1880年隨修信使一行人到日本學習，為種痘法的普及而努力。1882年為了鼓吹開化政策而上疏。1905年起草《新訂國文》，成為在學部設立國文研究所的契機。

⁵⁹ 《官報》第3200號，1905年7月19日。

⁶⁰ 不過，1909年時，在無法產生統一的見解的狀態下，不得不解散。

⁶¹ 三ツ井崇：《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言語》，頁48-50。

⁶² 月脚達彦：《朝鮮開化思想とナショナリズム——近代朝鮮の形成》，頁

等同於「國文」國族主義的性格，與以廢棄和中國的宗屬關係為主要目的的甲午改革相對照，已起了很大的變化。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形成這種意識變得十分明確。在俞吉濬所寫作的《大韓文典》的〈自序〉中有著：「我們的民族是檀君的靈秀的後裔，有固有的語言與特殊的文字，將思想與意志以聲音來發表，以記錄來傳達表示。言文一致的精神已經歷四千餘載的星霜，保存了歷史的真相，確證了風俗習慣的來龍去脈」⁶³ 這樣國粹的語言文字觀。此外，周時經也提到：「國家的盛衰繫乎語言的盛衰，國家的存亡繫乎語言的存亡」，⁶⁴ 強調國家與語言的密切的關係性。

(二) 關於「國文」與「國漢文」

將朝鮮語純粹以「國文」來表記的嘗試是由創刊於1896年4月的《獨立新聞》擔任先驅的角色。⁶⁵ 這是以同年7月結盟的開化派系的高級官僚為中心而結成的獨立協會的機關報這個角色而獲致的成果。從《獨立新聞》來看，「國文」的價值，在於不論上下貴賤都能見而知其意，而且容易學習。⁶⁶ 不同於以往，無論是世界情勢或者學問，都是大家能以「國文」看明白的事物，因此「人民的啓明」是可

300-311、341-349。

⁶³ 俞吉濬：《大韓文典·自序》（漢城：同文館，1909年），收於金敏洙、高永根編：《歷代韓國文法大系》（首爾：塔出版社，1979年），第1部，第2冊，頁1。

⁶⁴ 周時經：《國語文法·序》（漢城：博文書館，1910年），收於李基文編：《周時經全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76年），下冊，頁1。

⁶⁵ 1895年，名為《漢城新報》的隔日刊報紙創刊，四面中有兩面是以朝鮮語書寫的。然而，這份報紙接受了駐韓日本公使館的援助，以在朝鮮的日本人為對象來發行，自然而然地，朝鮮文字的使用所隱含的意味也被改變了。參見정진석：《극비 조선총독부의 언론 검열과 탄압》（서울：커뮤니케이션선북스，2007年）〔鄭晉錫：《極秘 朝鮮總督府的言論檢閱與鎮壓》（首爾：Communication Books，2007年）〕，頁13-15。

⁶⁶ 《독립신문》 제1호〔《獨立新聞》第1號〕，1896年4月7日。

能的。⁶⁷ 像這樣的思考方式，也是可在其他同時期的知識分子身上看到的思考方式。⁶⁸ 換句話說，這個時期的「獨立」有著從中國（的文化）獨立出來的意味，藉由「國文」，「人民」的「啓明」也被放置在那樣的脈絡之中。

理所當然，歷史上既然有「真諺翻謄」的施行，就沒道理說不存在以朝鮮文字來表現文章的形式。這裡可舉出先前提到的「傳令」的文例如下：

슈감내에 관속과 난류가 공전을 함포하며 저채을쓰고 족척을 침증
하난 폐업게하라⁶⁹

將這裡的漢字語改成漢字就成了：

巡甘內에 官屬과 亂類가 公錢을 欠逋하며 邸債을 쓰고 族戚을 侵徵
하난 弊業게하라

這確實就成了照著朝鮮語法書寫的東西。然而，起源於漢文的用語就這樣被保留著，對民眾而言並不是十分容易理解的文體。換句話說，以純「國文」體書寫一事，並不單只是將文字變成朝鮮文字而已，而是在於以「人民」的「啓明」的話題相呼應的形式上，不從事語彙與文體等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再來，以發音與表記的一致性作為前提，在漢字語的處理上特別顯著之外，也可見於規範的（傳統的）發音與

⁶⁷ 《독립신문》 제 112 호 [《獨立新聞》第 112 號]，1899 年 5 月 20 日。

⁶⁸ 例如：지석영：〈국문론〉，《大朝鮮獨立協會會報》第 1 號，1896 年 11 月；유상호：〈국문론〉，《독립신문》 제 47、48 호，1897 年 4 月 22、24 日] [池錫永：〈國文論〉，《大朝鮮獨立協會會報》第 1 號，1896 年 11 月；周相鎬：〈國文論〉，《獨立新聞》第 47、48 號，1897 年 4 月 22、24 日] 等。

⁶⁹ 《古文書》，卷 6，「傳令」295，轉引自山內民博：〈朝鮮後期鄉村社會と文字、文書——伝令と所志類をてがかりに〉，《韓国朝鮮の文化と社会》第 6 號，頁 31。另外，以下爲了方便部分朝鮮文字的標示而改以現代表記來標示。

實際的發音之間相齟齬的情況。由此可知，以純「國文」體來表記文體絕對不是容易的事。

作為替代的是當時廣為流行的被稱為「國漢文」的漢文與朝鮮文字交錯混用的文體。確實，關於「國漢文」的歷史成因眾說紛紜，並沒有統一的見解。再者，實際上被使用的文體也很多樣化。大致區分的話，大概存在著從「漢主國從」到「國主漢從」的幾種變化的形態。⁷⁰換句話說，前者是將朝鮮文字視為漢文句法的輔助添加物。相對於此，後者是將漢文的表現輔助性地呈現在朝鮮語的句法中。另外，若同時探問究竟這裡的漢文／中國語是固有的語彙還是近代的語彙，則變化的形態還會再稍微多一點。大致而言，「國漢文」是指「國主漢從」的文體。無論如何，「國漢文」之後成為公文書的主要文體，⁷¹雖然使用了朝鮮文字，漢字依然還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⁷⁰ 林相錫區分為：第1類型「漢文文章體、漢主國從之樣貌」、第2類型「漢文句節體、國主漢從之嘗試」、第3類型「漢文單語體、國主漢從之樣貌」。見임상석:《20세기 국한문체의 형성과정》(서울: 지식산업사, 2008年)[林相錫:《二十世紀國漢文體之形成過程》(首爾:知識產業社, 2008年)], 頁115-145。

⁷¹ 《官報》第3990號，1908年2月6日。這裡有如下的記述（引用文中的下引線為引用者所添加）：

一直以來使用於公文書類的文字並沒有國漢夾雜的情形。就是說以純漢文調製，然後混用吏讀的文體，全然與規例有所不同，再者，以外國人的身份而成為本國官吏的人，專用自國文，不但會有一般解釋上的貽誤之虞，也違反了規式，因此在閣議上另訂施行左述的條件，由內閣總理大臣向各部照會發行。

一、各官廳的公文書類都使用國漢文夾雜的文體。純漢文、吏讀，或者外國文字的雜用是不被允許的。

二、關於在外國官廳裡接受的公文，經過將原本正式處理的程序，附加譯本並加以存檔。

一月二十五日

又，姜明官引用此資料並將其視為「國文使用的原則被政府自己破壞掉了」的事例。姜大概是錯誤地將下引線部分引用成「純國文」，因此有像「從漢文到國文的轉換實屬不易」這樣的錯誤理解。見姜明官：〈漢文廢止論斗 愛國啓蒙期の 國、漢文論爭〉〔〈漢文廢止論與愛國啓蒙期的國、漢

事實上，還是存在著，雖不否定「國文」的獨立性，但認為把漢文當外國語來學習是「學術上、實業上、政治上不容置疑的急務」的想法，⁷² 或者那種若是全廢漢文（漢字）只用國文，則在需要理解「孝悌忠信」、「仁義禮智」等儒家的概念的場合會有所不便，因此應併用漢文的想法。⁷³ 光是上述所言，就存在著對漢字漢文的價值意識的差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總而言之，所謂的「國漢文」是將漢文與自家的國語分別看待的想法，這是在大幅度地轉換了看待漢字的價值後才成立的。俞吉濬在〈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1908）中主張，就是在「小學教育」的脈絡中，也不應該廢除漢文與漢字，而應將其視為「國文」的「附屬品」、「補助物」來加以利用。⁷⁴ 這裡，漢字不是稱為漢文的「前近代的」書面語的象徵，而是被置於現代書面語的補充物的位置。這是對於稱為漢字的東西的價值轉換。

當然，這樣的文字觀不是俞吉濬的創見。俞吉濬與福澤諭吉間的有關開化思想的影響關係已經多次被點出，如同先前所見，俞氏的漢字觀受到了福澤氏如下的想法的影響。

一、儘管日本有假名，而且與漢字交錯使用也有不妥當的時候，但自古以來一直這麼做，在全國日用的書寫都用漢字的情形下，現在要突然廢除也是不妥。現在這個時候，不妥當也不妥當地整合著，即便不妥當，使用上也還便利。漢字全廢之說在意願上是合理的，但實行上有其困難。為了實行此說，除了

文論爭〕，〈韓國漢文學研究〉第8輯（1985年12月），頁199。關於這一點，李基文也犯了同樣的引用的錯誤。見李基文：〈開化期の國文研究〉〔〈開化期の國文研究〉〕（首爾：一潮閣，1970年），頁20。

⁷² 李寶鏡：〈國文斗漢文의 過渡時代〉〔〈國文與漢文的過渡時代〉〕，〈太極學報〉第21號（1908年5月），頁18。

⁷³ 韓興教：〈國文斗漢文의 關係〉〔〈國文與漢文的關係〉〕，〈大韓留學生會學報〉第1號（1907年3月），頁72-73。

⁷⁴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 對하는 意見〉〔〈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皇城新聞〉第2799號，1908年6月10日。

等待以外別無其他合適的方法。⁷⁵

以「國漢文」寫作《西遊見聞》是，而同樣地，視漢字為「國文」的附屬物這種價值轉換也是，受到福澤氏這種想法，或者當時日本已定形的漢文訓讀文的存在的影響。⁷⁶

「國漢文」就是將漢字的部分就那樣以音讀為之。因此，漢字與發音的對應，也就是說若是不知道單字的意義就無法解讀文章。結果就是，對於漢字的認識依然是必要的要求。實際上，俞吉濬將漢字視為「附屬品」、「補助物」來利用的說法也是如此。關於這點，我想再稍微加以剖析。

俞吉濬指出，「小學是國民的根本教育，……在年幼的人腦中浸染認識人間的普通知識，使其與其習性相合，將來成為善良的國民」，其中的一個方法就是「具有使用國文的能力」。⁷⁷ 接著，關於理由與現狀則說明如下：

然而，擁有使用國文的能力，除了方便對於兒童的講習，同時也是為了養成自己的國家的精神。因此，大韓國兒童的教科書應該使用大韓國的語言。但從近來使用的小學書籍看來，就

⁷⁵ 福澤諭吉：〈文字之教〉，收於石河幹明編：《福澤全集》（東京：時事新報社，1926年），卷3，頁633。

⁷⁶ 月腳達彥以俞氏在《勞動夜學讀本》中所實踐的文體為例，指出那是「很清楚地意識到日本報紙的影響的文體」，「思索近代朝鮮語的文體之時，日本的文體，特別是與福澤氏的『通俗文』的關聯」是有必要加以注意的。參見쓰키야시 다쓰히코：〈朝鮮開化派와 후쿠자와 유키치（福澤諭吉）〉，《한국학연구》제26집（2012年2月）〔月腳達彥：〈朝鮮開化派與福澤諭吉〉，《韓國學研究》第26輯（2012年2月）〕，頁331-332。關於這一點，也請注意《福澤諭吉傳》裡如下的記述（石河幹明：《福澤諭吉傳》，卷3，頁298）：

（福澤）先生一直認為在朝鮮人的教育上，為了使文章變得平易，應該讓他們著眼於他們的諺文，也就是假名文字與漢字混合使用的文體。俞吉濬在三田家寓居之時，先生命令俞氏以漢諺混用的假名交錯文翻譯名叫〈文字之教〉的文章，翻譯文章不能不這樣來翻譯。

⁷⁷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對하는意見〉〔〈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

是國漢字混用的書籍，也是以漢字為主為來寫成的。使用音讀法，而使國字成為附屬品，作為小學用書，既算不上是國文，也算不上是漢文，而成為一種蝙蝠一樣的書籍。拿著這樣的書，滿教室的小孩子隨著老師高聲蛙鳴。要是有人問他們文意，則茫然有如坐在雲霧之中完全迷失方向的人，大概有十之八九，這是對國中的男女孩童實施鸚鵡教育。如此如何可得善美的結果呢？由此說來，小學教科書真是非專用國語不可。⁷⁸

立足於這樣的對現狀的認識，對於「當前我們對於小學教育最難最大的問題」，「一、國文專主。二、漢文全廢。」⁷⁹對此，俞吉濬指出「先生長者」們大概會很強烈反對，但「在新生未成熟的腸胃裡給予堅硬難消化的食物，不但對身體的滋養無益，也必然造成一生的痼疾。就像這樣用複雜難解的漢文來攪亂脆軟未成熟的頭腦的話，不但不能增長知識，而且會耗損精神釀成百年的疾祟。」⁸⁰但是，要這麼做才好呢？如下的自問自答持續進行：

如果是像那樣的話，也就是說，小學教科書的編纂應該專主國文，是嗎？對曰：是。如果是像那樣的話，也就是說，漢字應當被廢棄嗎？曰：不是。漢字如何可能廢除呢？漢文可廢除但漢字不能廢除。曰：使用漢字的話，換句話說不就是漢文了嗎？對孩子要全廢漢文的說法是我們至今還不明白的。曰：將漢字連綴起來，雖然說完成了句讀以後，就可以說是最初的文章了，但是字字將其分別使用，怎麼可以稱為漢文呢？正是因為我們借用漢字太久了，那個同化的習慣已經成為國語的一部分。一旦使用了訓讀的方法，就算有那個漢字的形體，也是我

⁷⁸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對하는意見〉〔〈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

⁷⁹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對하는意見〉〔〈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

⁸⁰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對하는意見〉〔〈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

們國文的附屬品、補助物。⁸¹

在這裡，所謂「訓讀」的方法被提示出來。關於這點，再來要觸及到俞吉濬講述句法的問題，說明如下：

一、錯節語，也就是如同漢語和英語一樣，上下交錯地表示句子的意義。

二、直節語，也就是像我國語以及日本語一樣，直接順讀以表示句子的意義。⁸²

接著，他總結：「現在，國漢字交混使用的書籍裡使用錯節禮法的話，這並不成爲文；將漢文以直節禮法行之也是如此。因此，就是有音讀文也務必要避免，只要訓讀以後，這個弊病就會自行消失了吧」。⁸³ 然而，那加之於「國漢文」上的「訓讀」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呢？同樣由俞吉濬執筆的《勞動夜學讀本》（1908）就是作爲實踐訓讀的例子而出名的。其中，可視爲特徵的是在漢語的語彙上加上假名注音這一點。具體的是面對漢字時，以固有語、漢字原來的注音、向來有的漢字（音）的再翻譯等加上假名注音來處理。⁸⁴ 不過，由假名注音的做法可看出，這與一直以來的「國漢文」不同，它同時存在著部分的文體的變化，⁸⁵ 這也意味著激進的嘗試。應當注意的是，將

⁸¹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對하는意見〉〔〈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

⁸²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對하는意見〉〔〈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

⁸³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對하는意見〉〔〈對於小學教育的意見〉〕。

⁸⁴ 以下文爲例（〔 〕內是俞吉濬：《勞動夜學讀本》（漢城：京城日報社，1908年）的頁數）。

在漢字上加上固有語的注音：人（사람）〔頁1〕、飛鳥（나는 새）〔頁2〕、我身（내 몸）〔頁13〕

以漢字原來的發音來注音：權利（권리）〔頁1〕、地位（디위）〔頁6〕

以向來有的其他漢字來置換漢字並標音：民（백성 < 百姓）〔頁3〕、私（사사 < 私事）〔頁9〕

⁸⁵ 以下文爲例。（〔 〕內是俞吉濬：《勞動夜學讀本》的頁數）。這些例子，在實質上可以說是以具有語彙的意味的朝鮮固有語（用言的語幹）來逐一

原文的漢字的部分全數以朝鮮語的假名注音加以置換的話，就成了接近純「國文」體的文章了。事實上，新人李人植⁸⁶的新小說〈血之淚〉（1906）在叫作《萬歲報》的報紙上連載時使用了假名注音，之後以單行本發行之時就完全成了國文體。然而，雖然俞氏在進入殖民時期後還是維持相同的主張，這樣的文體並沒有被普及化。

不過，一些非解決不可的課題依然存在。在「國漢文」的定型時期，由於內政外交方面都與日本的關係十分密切，使用的語彙也必然有很多是從日本語來的。在1908年7月21日的「關於韓國施政改善的協議會第四十六回大臣會議」席上，李完用⁸⁷發言講到「在最近的敕令和其他眾多法令裡，就依樣畫葫蘆地襲用日本的慣用語，對韓國人來說無法理解的東西很多，也因此任意地從事翻譯以至於不能理解的地方越來越多」，⁸⁸朝鮮語的書面語的世界，不只侷限於法令文，都補助性地使用漢字，而與日本語的使用之間起了一定的摩擦。

還有一個問題是綴字法（表記法）的問題。之前已經有關於當局方面的研究，但知識分子對朝鮮語的關心也確實還沒有觸及到這個問題。只要要求書面語的視覺統一性的問題沒解決，純「國文」化的實現就很困難。周時經論及的「近來以國語來寫作的文字都依據大家

對譯漢字。

가죽의 룬기가 亂운즉…… (> 언지러운즉) [頁3]

남이 출지 못하며…… (> 앓지) [頁3]

⁸⁶ 李人植（1862-1916），開化期的作家與言論家。1900年以官費留學生的身份前往日本，於東京政治學校學習，翌年成為《都新聞》的見習生。1903年回國，於日俄戰爭時期成為日本陸軍省的韓語通譯官。1906年成為《萬歲報》主筆，並發表長篇小說〈血之淚〉，成為「新小說」的嚆矢。

⁸⁷ 李完用（1858-1926），日俄戰爭後成為親日派官僚，於伊藤博文強迫簽訂第二次日韓條約之際率先表示贊同。之後成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內閣，進行強迫高宗退位的事宜。1910年8月以政府全權委員的身份代表處理韓國併合條約。之後也接受日本給的爵位，合作推行殖民地政策。

⁸⁸ 〈韓國施政改善ニ関スル協議會・第四十六回 大臣會議筆記〉，收於金正明編：《日韓外交資料集成》（東京：巖南堂書店，1964年），卷6，中冊，頁984。又，關於此史料之存在，參考了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頁499。

各自的意思，語言訛誤與文字誤用的弊病相雜，這不能成爲合適的言文……」，⁸⁹也顯示了這樣的事實。再來，由教育當局開始，民間知識分子之間也沒能提示一套統一的規範，就在這樣任其生滅的情形下，走向了殖民時期。

（三）漢文知識人的反彈

關於「國文」使用的糾葛有各種不一樣的形態。漢文被流放於公文式的世界之外，對很多知識分子來說意味著作爲自己的知識根源的儒學（朱子學）被否定了。原初，以儒學素養爲基礎的世界，對開化派而言也是如此，可是對象徵「開化」的言語文字改革的反彈，雖然是起自所謂儒學的復興的脈絡，可是有必要在檢視這個時期的言語改革問題之上加以討論。

那樣的糾葛在甲午改革末期表面化。1896年2月，被任命爲學部大臣的申箕善⁹⁰上疏堅辭就任該職。在疏文中，申氏有如下的陳述：

「學」這個字是我生平衷心嚮往而不能企及的。若是可以興發儒學於一個國家，獎勵文藝於世界，這難道不是我平素的願望嗎？但回頭看，則當今之學不同於古時之學。兩套義理並行的教育與國文漢文並用的文字，不是我所學的。⁹¹

就像從這裡就可以明白的，對申氏來說，興盛儒教仍具有重大的價值，「國漢並用之文」與那樣的「古之學」有其無法相容之處。接著在4月上疏的疏文中則說到：「國文與漢文的並用將會隳壞文字，廢棄經傳」，甚至說到「教授給才俊之士國文的注音法，是自絕於經

⁸⁹ 周時經：《國語文典音學》（漢城：博文書館，1908年），收於李基文編：《周時經全集》，下冊，頁3。

⁹⁰ 申箕善（1851-1909），朝鮮時代末期的文臣與思想家。

⁹¹ 申箕善：〈辭宣諭使學部大臣疏（丙申二月於清州）〉，《陽園遺集》，卷3，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申箕善全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1年），卷1，頁241。

傳，而從事由明入暗之學，則是化人爲獸」。⁹²

相對於申箕善這樣的反彈，《獨立新聞》提出反對的意見。在其1896年6月4日的報紙上批判道：「(不但)不是爲了朝鮮人而存在的東西，(難道)要再奉清國的正朔嗎？如果那麼想侍奉清國皇帝的話，那麼到清國去成爲清國的臣下是妥當的，沒什麼理由當朝鮮大君主陛下的臣下。」⁹³申箕善所批判的不單只是「國漢文並用」的問題。他是在對於諸如內閣制的導入、斷髮令、陽曆的導入等等，關於前近代的政治體制與宗屬關係的廢止的措施的反彈之下，進行對「國漢並用之文」的批判。他的批判全部指向開化政策，⁹⁴至於關於朝鮮文字使用的問題，則都是胚胎於1880年代的糾葛，以甲午改革爲端緒而得以表面化的。

在「保護國」期間的愛國啓蒙運動的潮流中，儘管「國文」的價值水漲船高，反彈也同樣持續著。1907年3月，以申箕善爲會長的大東學會開始運作。在大東學會的發展旨趣裡寫著「守孔孟之宗旨」、「庶幾儒教復明」。⁹⁵儘管這乍看之下可視爲衛正斥邪派的集合，實際上卻不是那樣的。根據李光麟所言，「這個學會的所屬人物有相當人數是從事初期開化派運動的開化派」，屬於「穩健派」和「東道西器論者」。毋寧說，他們是在1880年代受到衛正斥邪派非難的人物。⁹⁶在機關誌《大東學會月報》的創刊號上，金允植說到「以仁義道德爲體」的儒家與「利用厚生爲用」的「新學」，兩者「不可偏

⁹² 申箕善：〈抵城外辭學部大臣疏（四月）〉，《陽園遺集》，卷3，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申箕善全集》，卷1，頁244-245。

⁹³ 《독립신문》 제 26 호〔《獨立新聞》第26號〕，1896年6月4日。

⁹⁴ 參見申箕善：〈辭宣諭使學部大臣疏（丙申二月於清州）〉，《陽園遺集》，卷3，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申箕善全集》，卷1；申箕善：〈抵城外辭學部大臣疏（四月）〉，《陽園遺集》，卷3，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申箕善全集》，卷1。

⁹⁵ 申箕善：〈大東學會趣旨書〉，《大東學會月報》第1號（1908年2月），頁4。

⁹⁶ 李光麟：〈舊韓末新學斗 舊學斗의 論爭〉〔《舊韓末新學與舊學的論爭》〕，《東方學志》第23、24合輯（1980年2月），頁8。

廢」。⁹⁷也就是說，在看重「新學」的現狀認識下，以儒學為體「新學」為用的說法，不證自明地是意味著儒學的復興。先前所舉的發展旨趣裡，「守孔孟之宗旨」、「庶幾儒學復明」也有必要在這樣的脈絡中來考慮。⁹⁸漢文學者姜明官整理了關於《大東學會月報》與主導了愛國啓蒙運動的《皇城新聞》、《大韓每日申報》之間的論爭。⁹⁹有關論爭的大致的論點已經來回提過了，因此不再詳細說明，但是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大東學會的呂圭亨¹⁰⁰提倡將漢文（漢字）稱為「亞文」，從中國特出的文字這種印象脫出，成為亞細亞，特別是朝鮮、中國、日本共通的文字，將漢字漢文的問題置放為這三個國家的問題。¹⁰¹他還論及，「現在的小兒教科國文，其中有以漢文為我國國文之補佐使用的論者，這個看法很好，但也只在我國行得通而不能同於三國」。¹⁰²這雖然應該是意識到先前俞吉濬的見解而有的想法，但也是相對於愛國啓蒙運動的以民族國家主義（nationalism）為基礎的「國文」中心主義，而以立基於東洋三國的普遍主義的「漢文（漢字）中心主義」來加以對抗。¹⁰³這是後話，如果回頭比較一開始就舉出的現代的朝鮮文字專用論，就可以知道這是漢字使用容認論當中的一種高舉「國際化」的論調，¹⁰⁴而與此相似的構造在過去也存在。

⁹⁷ 金允植：〈序一〉，《大東學會月報》第1號（1908年2月），頁1。

⁹⁸ 就這個意義來說，與儒教改新論的愛國啓蒙運動（朴殷植等）之間的距離今後有必要再加以檢視討論。

⁹⁹ 參見姜明官：〈漢文廢止論과 愛國啓蒙期の 國、漢文論爭〉〔〈漢文廢止論與愛國啓蒙期の國、漢文論爭〉〕，《韓國漢文學研究》第8輯。

¹⁰⁰ 呂圭亨（1849-1922），漢學者、官僚。1907年成為官立漢城普通學校的教官。

¹⁰¹ 藕山居士：〈論亞文（續）〉，《大東學會月報》第5號（1908年6月），頁1。最初，像這樣以中國、朝鮮和日本為對象來加以掌握的東洋主義的思考方式，在愛國啓蒙運動中，也得到像朴殷植一樣的改新儒教派的人物信服，並不是呂氏特有的想法。

¹⁰² 藕山居士：〈論亞文（續）〉，《大東學會月報》第5號（1908年6月），頁3。

¹⁰³ 不過，俞吉濬自己也向《大東學會月報》投稿一事值得注意。

¹⁰⁴ 參見〈「한자」 국제화 대비 설득력 없다〉，《한겨레신문》，1994年3月18日；김석득：〈「한자교육 = 국제화」는 어거지 한글은 세계화에 대처하

回頭再說，大東學會的親日性格強烈，進入殖民時期後，在經學院的立場之下，甚至成爲希冀維持儒家秩序的儒林階層。反過來說，立足於親日立場的同時，希望守住漢字漢文的威信，這與愛國啓蒙運動的「國文」中心主義兩相對比，應該是十分意味深長的事。

五、殖民地時期至美國軍政下的朝鮮文字與漢字

(一) 殖民地時期¹⁰⁵

以下，根據筆者至今的研究，約略敘述有關從殖民地時期至美國軍政時期的朝鮮文字與漢字／漢文的價值意識的推移。

在純「國文」化的嘗試尚未達成目標以前，突然就進入殖民地時期了。朝鮮總督府，儘管不同於大家的期待，讓朝鮮語的規範化這個課題成爲「持續」進行的工作。雖然這個時期的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朝鮮語的書面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前展開的。在大韓帝國政府中擔任學政參與官、學部書記官，並在朝鮮教育令案策定時扮演重要角色的三土忠造¹⁰⁶對於當時的言語狀況有如下的記述：

今天同宗的奧地利與匈牙利無法統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各自以德語和匈牙利語（Magyarország）爲國文而互相對立。從這樣的前車之鑑來考慮，此刻以朝鮮的國語來說話雖然是沒辦法的事，但就文章的表現來說，從現在開始教育國民書寫的方法是絕對不能放棄的。¹⁰⁷

는 새로운 면모》，《주간 한국》 제 1514 호，1994年3月24日〔〈「漢字」與國際化的對比毫無說服力〉，《hankyoreh》新聞〕，1994年3月18日；金錫得：〈力推「漢字教育等同於國際化」是朝鮮文字對應於世界的嶄新面貌〉，《週刊韓國》第1514號，1994年3月24日〕等。

¹⁰⁵ 參見三ツ井崇：《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言語》，第2、7章。

¹⁰⁶ 三土忠造（1871-1948），政治家。曾擔任大韓帝國的學政參與官、學部書記官。

¹⁰⁷ 三土忠造：〈朝鮮人の教育〉，《教育界》第9卷第12號（1910年10月），

換句話說，三土氏察知朝鮮的書面語教育具有威脅日本的支配的危險性。然而，在朝鮮教育令制定之際（1911），關於朝鮮語地位的規定的議論左右搖擺不定。大澤宏紀透過隈本繁吉文書的檢討，「在朝鮮總督府的內部，關於『朝鮮語』的教授，從兼併當初，就特別是作為沒有異議的必修科目來構想」，「可是因為《朝鮮學制》起草的討論從朝鮮移往東京，因而成了左右搖擺的狀態」。¹⁰⁸ 有趣的是在這個過程裡提出的教案中，「夾雜了漢字的諺文」被舉出來當「諺文與漢文」的教科內容。¹⁰⁹ 儘管大澤氏未觸及，這其實可以被想作是實際的朝鮮的書面語，也就是「國漢文」的對應物，若考慮「國漢文」在走向近代以來扮演了近代的知識的導入的重要角色，那麼這裡所舉出的「夾雜了漢字的諺文」就非常有可能是被理解為日本的知識的導入的媒介。不過，如同大澤氏所指出的，有關教育令制定的討論一移往帝國教育會內的朝鮮教育調查委員會，可以意識到「諺文以及漢文」的全面撤廢的委員會發表的決定案，讓日本語以文字的形式作為公用語，公文書也全面以日本語來書寫。¹¹⁰ 結果，在帝國教育會評議員會的決議中，全面撤廢「諺文以及漢文」的事項被刪除，¹¹¹ 儘管說不上是什麼對等的關係，「朝鮮語（及漢文）」也作為一個科目殘留下來。於是，偽善的總督府不得不啟動朝鮮語的規範化。

頁26。

¹⁰⁸ 大澤宏紀：〈朝鮮總督府による「朝鮮語」教育——第一次、第二次朝鮮教育令下の普通学校を中心に〉，《教育史、比較教育論考》第19號（2009年3月），頁6。

¹⁰⁹ 大澤宏紀：〈朝鮮總督府による「朝鮮語」教育——第一次、第二次朝鮮教育令下の普通学校を中心に〉，《教育史、比較教育論考》第19號，頁4。

¹¹⁰ 參見《教育時論》第926號，1911年1月5日；井上薰：〈日本帝國主義の朝鮮に対する教育政策——第一次朝鮮教育令の成立過程における帝教育会の関与〉，《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62號（1994年1月），頁196。

¹¹¹ 井上薰：〈日本帝國主義の朝鮮に対する教育政策——第一次朝鮮教育令の成立過程における帝國教育会の関与〉，《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62號，頁197-198。

儘管在公領域使用日語是法律所規定的，朝鮮語沒道理在生活領域裡消失。雖然被置於與日本語不對稱的地位，朝鮮語與朝鮮文字的世界依然殘存著。對朝鮮的知識分子來說，這被置放於民族統合的象徵的位置，不變的是，在朝鮮社會裡，舊支配階級（兩班層）很多還是以漢文出版族譜文集之類的，漢字漢文的威信還是很強固的。¹¹² 也就是說，在朝鮮的知識分子之間，存在著認識的差異。以改變漢字／漢文的使用為目的，而具有「近代的」價值的朝鮮語／朝鮮文國族主義（Hangul nationalism）與各式各樣文字文化的「傳統」意識之間又有無法契合的領域存在。一方面如同「朝鮮文字之日」的制定，朝向單以朝鮮文字寄託民族的傳統價值，另一方面也有視漢字／漢文的書寫為早於朝鮮文字的文字文化（例如：文學）應當作為「傳統」的一部分來加以整編的趨勢。對於文字的民族價值的意識，絕對不是固定不變的。¹¹³ 作為後者的例證，這裡要來看文學研究者趙潤濟¹¹⁴ 的例子。趙氏在1929年2月的《東亞日報》上連載了名為〈朝鮮文學與漢文學〉的議論。該文論述的是在「朝鮮文學」的歷史裡，「漢文學」如何被理解的問題。在該文中，對於過去的漢文的導入，趙氏說道：「漢文並不是被當做外國文來考慮的，而被承認是本國文。」¹¹⁵ 對於文學作品，他說：「若是有應該被理解為朝鮮文學的點存在，就無法將它視為漢文學而捨棄。」¹¹⁶ 這裡重要的是，不是只有朝鮮文字才能作為象徵民族的工具。趙氏所指出的是，單以朝鮮文字來單一化民族的價值，將無法溯及比「民族文化」的起源更古老的東西，這可說是優異地向我們展示了民族主義的糾葛。

¹¹² 參見三ツ井崇：《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言語》，第2章。

¹¹³ 參見三ツ井崇：《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言語》，第7章。

¹¹⁴ 趙潤濟（1904-1976），朝鮮文學者。曾就讀於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朝鮮語朝鮮文學科。1930年代為朝鮮的古典文學體系打下基礎。

¹¹⁵ 趙潤濟：〈朝鮮文學斗漢文斗의關係（九）〉〔〈朝鮮文學與漢文的關係（九）〉〕，《東亞日報》，1929年2月18日。

¹¹⁶ 趙潤濟：〈朝鮮文學斗漢文斗의關係（一一）〉，《東亞日報》，1929年2月20日。

(二) 美國軍政時期¹¹⁷

如同上述一般在殖民地的狀態下的各種價值的對立，在美國軍政時期的南朝鮮的朝鮮文字專用化的推進過程中持續瀰漫著。

美國軍政下的語言政策是由軍政廳文教部所管轄的，可是實際上反映出的是同學會的意向在政策上幾近直接的影響。該會是殖民地時期的語言運動團體，與曾經在1942年受到日本打壓的朝鮮語學會的會員而彼時身為文教部學務局的委員們有往來。同學會從殖民地時期開始就是以推動朝鮮文字的專用化等同於漢字廢止為主要目的來活動的。許多朝鮮文字專用論者作為諮詢委員加入學務局設置的諮詢機關。接著，1945年12月，反映了這些朝鮮文字專用論者意見的〈朝鮮文字採用決議案〉由文教部學務局裁定認可。

在這個諮詢機關的內部，關於漢字的廢止，與朝鮮語學會有關的委員和同樣也是諮詢委員的趙潤濟等兩造間存在著對立的意見。相對於大半是漢字全廢論者，趙氏等兩人則是漢字擁護論者。趙氏接受決議時所言如下。他說：「在民族教育之上，尊重民族的傳統精神，而民族的傳統精神與國語的關係十分密切，因此說國語與教育的關係幾乎是不可分離的並非過言。」¹¹⁸ 文教部的漢字廢止的決定「是攸關民族的發展與國家命運的國家大事」。¹¹⁹ 趙氏批評：「漢字廢止的原初構想，我們人人都滿腔表示贊同」，但與此同時，在「相當的專門的研究與緻密的計劃」付之闕如的狀態下「無條件地廢止」，「如果不是愚蠢的規劃就是一種誕妄的施策」。¹²⁰ 這個背景是立基於存在著「在兩

¹¹⁷ 三ツ井崇：〈解放後南朝鮮／韓国の言語運動、政策と「言語運動史」——植民地期との「連続」に注目して〉，《歴史學研究》第875號（2011年1月），頁15-17。

¹¹⁸ 趙潤濟：《國語教育의 當面한 問題》〔《國語教育所面臨的問題》〕（首爾：株式會社文化堂，1947年），頁15。

¹¹⁹ 趙潤濟：《國語教育의 當面한 問題》〔《國語教育所面臨的問題》〕，頁102。

¹²⁰ 趙潤濟：《國語教育의 當面한 問題》〔《國語教育所面臨的問題》〕，頁105。

千餘年的歷史裡將其當作純然是國字來使用」的認識。¹²¹ 換句話說，是基於「國語」教育也包含了漢字教育的理解，而不是「朝鮮文字等同於民族」和「漢字等同於非民族」的認識。

在軍政期終結，大韓民國建國（1948）以後，朝鮮文字專用化的方針持續進行。不過，在最初的階段，如果考慮到本文的開頭所揭示的〈關於「朝鮮文字」專用之法律〉所言，「只是在短期內，必要時也可與漢字並用之」這種不保留不行的狀態，則朝鮮文字與漢字（漢文）的糾葛關係也還依舊是需要被克服的一大課題。

六、結論

本稿考察了開化期朝鮮朝鮮文字／朝鮮語與漢字／漢文之間的糾葛關係的演變及其背景。現在若再一次加以整理的話，第一，朝鮮文字的「國文」化，從階級化、性別化的使用經歷了「國民」化的過程，以與清的宗屬關係的演變為背景，政治意義也有所變化。第二，「國文」化了的文章實際上採用的文體是「國漢文」，這個文體除了有許多異體存在以外，這個「國主漢從」的文體，在對漢字的價值轉換的同時，也趨向導入「訓讀」作為走向純「國文」化的激進的嘗試。第三，「國文」的使用公式化以後，漢字與漢文在固有的儒學復興的脈絡裡依然是被稱頌的強而有力的存在。第四，「國文」與漢字漢文的糾葛，儘管在殖民地時期與美國軍政時期的脈絡有所不同，但一樣被繼承下來了。

〈關於「朝鮮文字」專用之法律〉的制定是在1948年9月15日經由139名國會議員的動議而開始的。¹²² 之後，在第78次的會議裡往上呈示，從9月30日起經過兩天的審議與質疑而做出裁決。接著，

¹²¹ 趙潤濟：《國語教育의 當面한 問題》〔《國語教育所面臨的問題》〕，頁105。

¹²²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委員局資料編纂課編：《國會史》（首爾：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1971年），頁34。

其公布施行日10月9日也就是「朝鮮文字之日」，這同時帶有展示民族的象徵的意味。

該會議之時，關於法案的旨趣，被舉出來的有，「三千萬的我族裡有相當於八成的」「勞農方面」的人口，換句話說大約2,400萬以上的人無法理解漢文，¹²³（因此）解放後朝鮮文字的專用化是急速地進行的北朝鮮／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統一所必要的。¹²⁴ 在本會議的質疑中則是，要作為法律而具有明文化的性格嗎？共用文書的範圍界線在哪裡？無法容任漢字廢止等意見也出現了。特別是關於最後一項，從所有的語言與文字生活來看可以得知，因為漢字的消失是不可能的，雖然外於法律案的旨趣之外，在當時的韓國社會裡，如同以往，文字生活並沒有被朝鮮文字一元化。之後，在韓國社會的文字生活上，朝鮮文字的專用化持續進行。在此過程中，集中於批判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而批判漢字／漢文使用的事大主義的朝鮮文字專用論的見解，在很大程度上被終結了。然而，那只限於從論爭化的現象來看，文字意識的糾葛依然照舊存在著。同時要被思考的是，那被忘卻了的難道不是對開化期的語言文字狀況的認識？為了將這個問題放置在近代的脈絡，有必要從殖民地化以前的狀況來再做檢討。本稿希望有幸能在此議題的討論上有所助益。

（責任編輯：李冀）

¹²³ 國會文教厚生委員長朱基瑢的發言（1948年9月30日），收於《第1回國會速記錄》（首爾：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1948年），第78號，頁29。閱覽自「大韓民國國會會議錄系統」，網址：<http://likms.assembly.go.kr/record/index.html>，檢索日期：2012年8月1日。

¹²⁴ 建議者權泰義議員的發言（1948年9月30日），收於《第1回國會速記錄》，第78號，頁30-31。

徵引書目

- 〈「한자」국제화 대비 설득력 없다〉, 《한겨레신문》, 1994年3月18日。
- 〈公文式〉, 1894年11月21日公布, 收於宋炳基、朴容玉、朴漢高編著: 《韓末近代法令資料集 I》, 首爾: 大韓民國國會圖書館, 1970年。
- 〈日鮮修好條約ノ締結 第二 第四節 修好條約ノ締結〉, 東京: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JACAR), Ref.B06150029100, 第397個圖像。
- 〈韓国施政改善ニ関スル協議會第四十六回 大臣會議筆記〉, 收於金正明編: 《日韓外交資料集成》, 東京: 巖南堂書店, 1964年, 卷6, 中冊。
- 《古文書》, 卷6, 「傳令」295, 轉引自山內民博: 〈朝鮮後期鄉村社會と文字、文書——伝令と所志類をてがかりに〉, 《韓国朝鮮の文化と社会》第6號, 2007年10月。
- 《高宗實錄》, 卷十三, 丙子十三 (1876) 年二月初三日條。
- 《官報》第3200號, 1905年7月19日。
- 《官報》第3990號, 1908年2月6日。
- 《教育時論》第926號, 1911年1月5日。
- 《독립신문》제112호, 1899年5月20日。
- 《독립신문》제1호, 1896年4月7日。
- 《독립신문》제26호, 1896年6月4日。
- 《承政院日記》, 高宗二十年癸未一月廿一日 (1883年2月27日)。
- 《日鮮修好條規關係一件 第二卷》(B-2-1-1-47-002), 東京: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 《第1回國會速記錄》, 首爾: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 1948年, 第78號。閱覽自「大韓民國國會會議錄系統」, 網址: <http://likms.assembly.go.kr/record/index.html>, 檢索日期: 2012年8月1日。

- 姜明官：〈漢文廢止論과 愛國啓蒙期の 國、漢文論爭〉，《韓國漢文學研究》第8輯，1985年12月。
- 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年。
- 金允植：〈序一〉，《大東學會月報》第1號，1908年2月。
- 大澤宏紀：〈朝鮮總督府による「朝鮮語」教育——第一次、第二次朝鮮教育令下の普通学校を中心に〉，《教育史、比較教育論考》第19號，2009年3月。
- 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委員局資料編纂課編：《國會史》，首爾：大韓民國國會事務處，1971年。
- 稻葉繼雄：〈井上角五郎と《漢城旬報》《漢城周報》——ハングル採用問題を中心に〉，《文藝言語研究（言語篇）》第12號，1987年9月。
- 李光麟：〈《易言》과 韓國의 開化思想〉，收於李光麟：《韓國開化史研究》，서울：一潮閣，1974年，改訂版。
- 李光麟：〈舊韓末新學과 舊學과의 論争〉，《東方學志》23、24合輯，1980年2月。
- 李光麟：〈漢城旬報와 漢城周報에 대한 一考察〉，收於李光麟：《韓國開化史研究》，서울：一潮閣，1974年，改訂版。
- 李覲洙：〈朝鮮朝의 國語政策史〉，《漢城大學論文集》第3號，1979年12月。
- 李基文：《開化期の 國文研究》，서울：一潮閣，1970年。
- 李寶鏡：〈國文과 漢文의 過渡時代〉，《太極學報》第21號，1908年5月。
- 福澤諭吉：〈文字之教〉，收於石河幹明編：《福澤全集》，東京：時事新報社，1926年，卷3。
- 福澤諭吉：〈井上角五郎宛福澤諭吉書簡、明治16年12月15日〉，收於慶應義塾編：《福澤諭吉書簡集》，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卷4。

- 山内民博：〈朝鮮後期鄉村社会と文字、文書——伝令と所志類をてがかりに〉，《韓国朝鮮の文化と社会》第6號，2007年10月。
- 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
- 山野車輪：《マンガ嫌韓流》，東京：晉遊舎，2005年。
- 三ツ井崇：〈解放後南朝鮮／韓国の言語運動、政策と「言語運動史」——植民地期との「連続」に注目して〉，《歴史學研究》第875號，2011年1月。
- 三ツ井崇：《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言語》，東京：明石書店，2010年。
- 三土忠造：〈朝鮮人の教育〉，《教育界》第9卷第12號，1910年10月。
- 石河幹明：《福澤諭吉傳》，東京：岩波書店，1932年，卷3。
- 申箕善：〈大東學會趣旨書〉，《大東學會月報》第1號，1908年2月。
- 申箕善：〈辭宣諭使學部大臣疏（丙申二月於清州）〉，《陽園遺集》，卷3，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申箕善全集》，서울：亞細亞文化社，1981年，卷1。
- 申箕善：〈抵城外辭學部大臣疏（四月）〉，《陽園遺集》，卷3，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申箕善全集》，서울：亞細亞文化社，1981年，卷1。
- 藕山居士：〈論亞文（續）〉，《大東學會月報》第5號，1908年6月。
- 原田環：〈井上角五郎と《漢城旬報》〉，《季刊三千里》第40號，1984年11月。
- 月脚達彦：〈甲午改革の近代国家構想〉，《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第33集，1995年10月。
- 月脚達彦：《朝鮮開化思想とナショナリズム——近代朝鮮の形成》，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9年。
- 俞吉濬：〈小學教育에對하는意見〉，《皇城新聞》第2799號，1908年6月10日。
- 俞吉濬：〈朝鮮文典・序〉，收於金敏洙、高永根編：《歷代韓國文法

- 大系》，서울：塔出版社，1977年，第1部，第1冊。
- 俞吉濬：《大韓文典·自序》，漢城：同文館，1909年，收於金敏洙、高永根編：《歷代韓國文法大系》，서울：塔出版社，1979年，第1部，第2冊。
- 俞吉濬：《勞動夜學讀本》，漢城：京城日報社，1908年。
- 俞吉濬：《西遊見聞（全）·序》，東京：交詢社，1895年，收於俞吉濬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俞吉濬全書》，第1冊，首爾：一潮閣，1970年。
- 伊藤英人：〈朝鮮半島の書記史——不可避の自己としての漢語〉，收於中村春作、市來津由彦、田尻祐一郎、前田勉編：《続「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2010年。
- 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關係の研究》，京城：朝鮮總督府中樞院，1940年，上卷。
- 井上角五郎：《福沢先生の朝鮮御經營と現代朝鮮の文化とに就いて》，收於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政治篇》，《舊韓末日帝侵略史料叢書》，第7冊，서울：亞細亞文化社，1984年。
- 井上薰：〈日本帝國主義の朝鮮に対する教育政策——第一次朝鮮教育令の成立過程における帝國教育会の関与〉，《北海道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62號，1994年1月。
- 鄭晉錫編：《韓國言論法令全集（1945-1981）》，서울：財團法人寬勳club 信永研究基金，1982年。
- 糟谷憲一：〈近代的外交体制の創出——朝鮮の場合を中心に〉，收於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外交と戦争》，《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第2輯，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
- 趙潤濟：〈朝鮮文學斗漢文斗의關係（九）〉，《東亞日報》，1929年2月18日。

趙潤濟：〈朝鮮文學과漢文과의關係（一一）〉，《東亞日報》，1929年2月20日。

趙潤濟：《國語教育의當面한問題》，首爾：株式會社文化堂，1947年。

周時經：《國語文法·序》，漢城：博文書館，1910年，收於李基文編：《周時經全集》，서울：亞細亞文化社，1976年，下冊。

周時經：《國語文典音學》，漢城：博文書館，1908年，收於李基文編：《周時經全集》，서울：亞細亞文化社，1976年，下冊。

韓興教：〈國文과漢文의關係〉，《大韓留學生會學報》第1號，1907年3月。

김봉진：〈개화기 신문과 일본：후쿠자와 유키치를 중심으로〉，收於위암장지연선생기념사업회：《한국근대언론의 재조명》，서울：커뮤니케이션북스，2001年。

김석득：〈「한자교육 = 국제화」는 어거지 한글은 세계화에 대처하는 새로운 면모〉，《주간 한국》제1514호，1994年3月24日。

쓰키야시 다쓰히코：〈朝鮮開化派와 후쿠자와 유키치（福澤諭吉）〉，《한국학연구》제26집，2012年2月。

임상석：《20세기 국한문체의 형성과정》，서울：지식산업사，2008年。

정진석：《극비 조선총독부의 언론 검열과 탄압》，서울：커뮤니케이션북스，2007年。

쥬상호：〈국문론〉，《독립신문》제47、48호，1897年4月22、24日。

지석영：〈국문론〉，《大朝鮮獨立協會會報》第1號，1896年11月。

최기호：〈역사는 이미「한글세대」를 선언하고 있다：「한자교육 = 국제화」는 지나친 논리의 비약〉，《한국대학신보》，1994年3月21日。

한글 학회：《「고통의 문자」와 부활시키려 하는가》，서울：한글학회，1994年。

허응：〈한자혼용론 거래얼정면도전〉，《한겨레신문》，1994年3月18日。

허재영 : 〈식민 교육의 잔재 한자교육 구시대적 망령이 되살아난다〉, 《建大新聞》, 1994年3月14日。

허재영 : 〈한자복권론, 일제말 식민지배자논리와 동일〉, 《상명대학보》, 1994年4月4日。